

苏联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对 非俄罗斯人的回答

〔美〕S·恩德斯·威姆布什

一、前言

苏联当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各种各样复杂因素发展的结果，这些因素通常涉及一些莫名其妙、难以分析的个别事例，涉及为民族重新进化和精神上的复兴所作的更加共同的努力，涉及对俄罗斯族本身的存在直接外部威胁。过去我对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作了较为综合性的研究，所以我对这一系列因素和俄罗斯人对其回答给予极大的注意。^①在这份研究报告中，我将集中探讨这方面的一个部分——当前俄罗斯人对苏联非俄罗斯人的各种威胁和挑衅所作的回答。我将论证，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威胁和挑衅是苏联独特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条件发展的结果。因而，俄罗斯人对其所作出的以新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甚至以新俄罗斯民族主义为特征的回答也是特殊的，它不简单地是一种怪现象——多少世纪以来不能改变、依然如故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复苏。我将鉴别这些因素，描述形成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课题及其政治色彩，估价俄罗斯民族主义对当局需要动员大量苏联公民去把守国家大门的可能冲击。最后，我将考虑到俄罗斯民族主义对维持未来苏联多民族国家的稳定所产生的潜在效果。

二、新的冲突根源：原因和催化剂

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的最初年代里曾经千方百计地试图防止苏联少数民族的疏远，包括大量监禁那些力图使人相信这场革命意欲在非俄罗斯人的边疆地区建立俄罗斯政权的俄罗斯人。斯大林对少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立场更加露骨。他排除并消灭了现实的或潜在的非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在苏联边疆地区制造了一种镇压气氛，使当地民族主义者挑战时要冒很大风险。中亚、高加索和乌克兰的非俄罗斯民族主义共产党人不时遭到清洗，他们的运动被强大的暴力所驱散，四处漂移的游牧哥萨克人付出了巨大的人力代价后被定居了下来。整个整个的民族集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真正的或被诬控的反苏或亲德罪名被流放。当地的共产党组织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之名被定期清洗。通过诸如此类的措施，斯大林当局排除了任何实际威胁而树立了俄罗斯的优势。

相应地，斯大林鼓励俄罗斯人把苏联看成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俄罗斯族在这个国家内拥有无可争辩的优势。这个倾向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因需要动员俄罗斯人保卫祖国而获得了顺利发展。斯大林在1945年庆祝胜利时为大俄罗斯人祝酒，标志着对俄罗斯族战时所作的巨大牺牲的重大让步。重要的是，这些让步包含一些在苏联各民族排列次序上的教条主义变化：

^①S·恩德斯·威姆布什：《大俄罗斯人与苏维埃国家：民族优势的真正困境》，载杰里米·R·阿兹列主编《苏联民族政策与实践》，纽约1978年版。

俄罗斯人成了无可争辩的“老大哥”。“小害”理论——俄罗斯征服边疆各民族被标榜为比被英国、波斯或土耳其征服所带来的灾难要小——是在1952年10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为了支持“大利”概念而抛出来的。根据后来的思想，俄罗斯人的征服不仅被说成是最坏形势中的最好出路，而且简直是天赐，因为，反过来说，这样一来原始社会便会处于俄罗斯文化的文明影响之下。这种戏剧性的重要转变，在非俄罗斯民族重写的历史中被强调，从前被公开赞美为进步自由战士的当地民族英雄沙米尔和凯涅萨利·加西莫夫被攻击成反动派，因为他们抵抗俄罗斯人进入他们的领土。^①过去颂扬为民族艺术杰出典范的苏联穆斯林民族的民族史诗，被谴责成大逆不道和反俄罗斯。^②同时，俄罗斯人则被提高到“老大哥”的地位，他们以领导不开化的小兄弟脱离落后状态而倍受尊敬。

由于采取了这些政策并因为在战争中的领导，斯大林提高了他在俄罗斯人心目中作为真正俄国领导人的形象；俄罗斯人从不怀疑他的才干和对付苏联边疆令人烦恼且不堪信任的非俄罗斯人的决心。在他1953年逝世时，苏联政治领域里没有发生任何可以确定为持异议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的事情。一般说来，不管正确与否，在这段时间当局是接受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的攻击，许多俄罗斯人是以痛苦心情接受下来的。对许多人来说，斯大林确实是使俄罗斯重建成一个世界强国和中心帝国的俄国领导人，他使许多俄罗斯人组成正式的国际主义思想体系。他的逝世突出了失去强大领导的俄罗斯幽灵；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使许多俄罗斯人对新领导增加了莫大疑虑，也使许多人确信俄国的威望必将在国内外大为下降。事实上，这次打击的第一场灾难便是针对俄国“老大哥”概念的，赫鲁晓夫在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使这一教条受到严重损害，他认为根源在于“存在于沙皇俄国各民族之间的互不信任”。^③这个修正立即使斯大林历史学家冥思苦索拼凑起来的“各民族友爱”的整个概念失去灵验。

赫鲁晓夫增加了俄罗斯人的担心，他们对新领导的疑虑被重新提出的就苏联“民族问题”的讨论和辩论所加剧。而且，赫鲁晓夫强调要使发展比率相等，要对苏联所有民族提供同样的机会。对许多非俄罗斯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现在有权分享国家资源的很大一份；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将被动员对其他人作出牺牲，如同后者过去所做的一样。另外，赫鲁晓夫对作为真正正统来源和动员工具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赋予了新的意义。他力图把这个思想解释为这样一些概念：通过高速经济发展——建设共产主义——进行社会改革；使苏联各民族从生物学上融合为一个更高级的共同体——“苏联人民”。为大多数俄罗斯人所承认的高速经济发展将把他们带到同非俄罗斯人的多余接触中，同时俄罗斯族珍贵的人力、物力资源将为了恩赐其他民族而消耗殆尽。生物学同化思想将促使非俄罗斯人中间更加俄罗斯化，但它也预示日渐形成的苏联文化（尽管更俄罗斯化）与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文化相比，将在民族性和文化特点上更多样化。随之而来的是，这个概念又引起了异族通婚和民族退化的令人厌恶的图景。

当赫鲁晓夫推行其非斯大林化努力的最初阶段宣扬文艺“解冻”时，非俄罗斯人抓住这

^①洛厄尔·R·蒂莱特：《苏联有关沙皇殖民主义的第二种思想》，载《外交文件》第42卷第2号（1964.1）第310—314页。

^②见亚历山大·本尼格森：《突厥民族史诗的危机：地方民族主义还是国际主义？》，载《加拿大斯拉夫论文集》第17卷2、3期（1975夏、秋），第463—474页。

^③见蒂莱特前引文，第315页。

个时机要求复查他们民族文化的处境及这些文化同俄罗斯文化的关系。许多非俄罗斯人公开认定，过去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教条主义概念是错误的、令人讨厌的。编写较新的历史时对“大利”概念提出了挑战，象沙米尔一类先前受到中伤的民族英雄恢复到原受尊敬的程度。重要的是，非俄罗斯历史学家开始公开辩驳俄罗斯文化对他们民族文化的“进步”冲击，提出俄罗斯文化对已经处在丰富完美文化环境之中的民族文化无甚价值。赫鲁晓夫起劲地鼓吹这些转折，尽管他后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废除了这些特许。不过，非俄罗斯人的这种自我肯定模式一直延续到当前，甚至变成了一种意料不到的转折。不久以前，一位突厥血统的苏联学者大胆声称，“大利”公式应该加以推翻，利益是通过其他途径取得的。根据他的思想，俄罗斯人极大地受益于鞑靼人的枷锁。他论证说，俄罗斯文化，包括俄罗斯民族史诗——伊戈尔叙事诗，是吸收并大量借用亚洲模式写成的。^①

俄罗斯人对这些事态发展的担心日趋明显，因为一些非俄罗斯人用公开抗议形式突出他们的这种自我肯定。犹太人要求移居到国外。战时被流放到中亚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和麦斯赫蒂亚土耳其人等大批少数民族，在苏联各大城市听觉所及的范围内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地区性的暴力骚动相继在高加索和波罗的海沿岸发生。苏联摩尔达维亚人收复领土的要求有了加强。乌克兰人在各个政治领域发起了抗议运动，既有说理斗争，也有诉诸行动的举动。在中亚，当地的名流进行自我颂扬并力求把他们的“民族”团结起来；这些民族是俄罗斯人在早些年代为了防止形成反对他们的泛突厥或泛伊斯兰同盟而建立的。在非俄罗斯人共和国，俄罗斯人日益成为社会歧视，甚至暴力行为的目标，也越来越经常而公开地成为暴发“俄罗斯人滚回去！”这种地方情绪的对象。

作为苏联边疆地区这类公开抗议、动荡与反叛幽灵的陪衬，1970年人口普查披露了非俄罗斯人口有了很大增长，而俄罗斯人（以及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这些苏联大的斯拉夫民族）则迅速向零值人口增长率接近。这次普查第一次使人看得清楚，如果目前趋势继续下去，则未来几十年内俄罗斯人在其绝对数上将开始下降；另一方面，苏联穆斯林少数民族将继续明显地增长，使俄罗斯人最终将在其本国成为人口上居少数的可能性加大。更为直接的是，苏联决策人面临着在改变人口学环境方面的资源分配问题，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名流争夺重要职位日趋尖锐的竞争问题，俄罗斯人对边疆的控制将要减弱或失去控制的问题。这样，这次人口普查数据就刺激当局发动一场关于苏联社会的民族课题的讨论。

另一个重要因素和时机有助于俄罗斯民族意识的提高，但对多数俄罗斯人来说，苏联少数民族中间新的自我肯定是特别使人头痛的。苏联和中国之间因边界争端引起的军事冲突，加剧了这种忧虑。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条严密设防的边界延伸四千多英里，任何试图越过俄国边防部队第一道防线的中国入侵部队都将发现，除俄罗斯人外，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其他亚洲人对苏维埃国家的忠诚都是有问题的，他们普遍用这样的事实嘲笑俄罗斯权贵：“只要中国人一来，他们就会教训你们的！”^②早在六十年代初期，俄罗斯人就开始感觉到这种种威胁，并在官方报刊上讨论可能的解决途径，漂流国外的索尔仁尼琴等也参加了讨论。这就是我要转换的讨论课题。

^①《对奥尔扎斯·苏雷麦诺夫一书的讨论》，载《历史问题》杂志1976年第9期第147—154页。

^②伊戈尔·沙发列维奇：《分离还是和解？——苏联民族问题》，载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等编，《在卢布的影响下》，纽约1976年版第87页。

三、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研究课题

俄罗斯人对非俄罗斯人直接或间接威胁的一种经常谈论着的回答是，拒绝承认苏联被迫“国际主义化”的主要是非俄罗斯人。苏联“民主反对派”的主要成员伊戈尔·沙发列维奇论证说，“当其他民族还被鼓励去积极维护民族特性时”，俄罗斯文化是第一个贡献给苏维埃国际主义的。他断定，当少数民族文化被小心翼翼地对待时，俄罗斯文化则在“大国沙文主义”借口下不时成为被猛烈攻击的目标。他还论证说，事实上，这种攻击“只不过是等于要扑灭俄罗斯民族意识的任何表现”。^①象索尔仁尼琴等人一样，他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目标是“使所有民族最大限度的灭亡”，因而这个外因的思想体系总是要通过的。但是，把非俄罗斯人说成是它的最初靶标也是不真实的：“俄罗斯人受害不比任何人为差；实际上，他们是首当其冲受到攻击的”。^②

索尔仁尼琴还援引了另一个恰如其分的注释来说明这个论证。他主张，俄罗斯人对苏维埃制度在少数民族身上所作的任何事情没有道义上的责任。许多少数民族（索尔仁尼琴这里列举了犹太人、拉脱维亚人等的革命贡献）曾协助苏维埃掌握了政权。他问道：“革命经历早期年代后不再具有外国入侵的特性了吗？”^③这个论据又可引伸到俄罗斯历史上的敌人。他解释说：“如果我们使之伤心的那些人事先已使我们伤过心的话，我们的内疚之感就不会那么强烈，他们的内心缓和和沉默同我们是一样的”。这是一种习惯，他拒不承认对克里米亚鞑靼人悲惨处境有任何责任，而把他们归之为“金帐汗国的残余”。^④类似的论据促使一些俄罗斯人对文化事务中国际主义因素与民族因素的教条主义命令式的汇合表示异议。俄罗斯民间作家弗拉基米尔·索洛金明确地问道，他怎么可能用同一个国际主义风格为所有民族进行创作呢？他断定，作为一个俄罗斯人，对他最好还是“按我自己的俄罗斯性格，或我自己的俄罗斯乡村气息，或我自己的俄罗斯民族”^⑤进行创作。

其他俄罗斯人对苏联国际主义的另一面提出异议：赖以使苏联各民族包括俄罗斯人更趋国际主义化的社会一体化公式，将使他们逐步“接近”并最后“融合”（生物学上的同化）为新的“苏联人民”。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这个公式的最后阶段意味着俄罗斯人同深肤色非俄罗斯人之间更多的通婚，意味着终将导致俄罗斯社会的“黄化”（yellowing）。一些开门见山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纲领告诫说，这种“胡乱混杂现象”将造成俄罗斯民族和其他白肤种族的“生物学退化”。这类种族主题甚至在官方报刊上获得了支持者。一位俄罗斯学者论证说，民族（ethnos）这个使各民族集团相互间加以区别的难以确定的“实体”，是生物学所决定的。因而，他断定，异族通婚将最终导致后代在遗传上的退化；这种退化将导致由异族通婚后代所构成的政治国家和社会体制的下降。按照这位学者的观点，民族同化就等于民族自杀。^⑥

俄罗斯人不仅攻击同非俄罗斯人在生物学上的混杂，还攻击对后者在经济上的支持。拥有国家组织的一些不断发展着的少数民族，其中每一个离开科学院、标准语、其他新形成的

①同上，第94页。

②同上，第96页。

③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各民族生活中的忏悔和自我限制》，同上引书，第125页。

④同上，第132页。

⑤弗拉基米尔·索洛金：《抒情诗》，莫斯科1965年版第104—105页。

⑥V·I·科兹洛夫：《论民族历史的生物学—地理观》，载《历史问题》1974年第12期第72—85页。

文化传统和民族领土等方面的支持，就不能保持住；这些都是使俄罗斯人付出高昂代价的。再者，许多俄罗斯人抱怨说，由于苏联的领土区划同民族分布不相符合，大批俄罗斯人集中留在其他正式称为非俄罗斯人的共和国，那里他们便成了官方和个人歧视的目标。他们声称，这个问题需要通过重新划定边界以扩大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版图来解决，而这是以牺牲有大量俄罗斯人聚居的共和国，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乌克兰、巴什基尔、鞑靼、摩尔达维亚和卡累里阿自治共和国为前提的。其他俄罗斯人仍然争辩说，正是由于俄罗斯人创造了苏维埃国家，苏联各少数民族的存在才成为可能，因此，俄罗斯人应自由开发这个帝国以造福于自己。

对大多数俄罗斯人最为利害攸关的是未来的资源分配项目，它们将决定能否给俄罗斯民族带来立即见效的或长期的利益。这样，少数民族经济的继续发展即使不是危险的，也是浪费的、愚蠢的作法。一些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论证说：首先、少数民族可以选用他们新发现的经济力量向莫斯科挑战。第二、少数民族暴露出对俄罗斯人的这些牺牲忘恩负义，因此，不配享有更多的投资。第三、这些珍贵的人力、物力资源对于发展俄罗斯本身待发展地区（诸如俄罗斯北方和西伯利亚）是极为需要的。其他人之中，索尔仁尼琴向苏联领导提出了强硬要求，他要求把注意力转向这些地区，因为它们可以成为俄罗斯人反抗外来压力，包括人口迅速增长的少数民族不可避免的闹事的最后安全地带。^①大多数俄罗斯人认识到，解决资源问题不容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由于俄罗斯人劳动力已经紧张以及迫近的能源短缺，就这些问题进行的辩论一定会更加尖锐激烈。劳动力不足就要迫使动员大批中亚人到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劳动；能源短缺则将促使当局不仅要重新考虑对东欧的能源支援，而且也很可能重新考虑对苏联少数民族的发展策略。它还必然使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卷进这些辩论。

伴随这些文化、种族和经济观点而来的政治推论是各种各样的。最重要的一类不同意见是在主张加强俄罗斯民族——小俄罗斯——与主张建立一个帝国的两部分俄罗斯人之间展开的。持前一种立场的人论证说，俄罗斯应该在历史上属于俄罗斯人或目前主要为俄罗斯人聚居的领土上加以重建。非俄罗斯人应准予返回他们原来的地方，俄罗斯的资源应当只用于俄罗斯本身的发展。持建立大俄罗斯帝国思想的人，在如何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意见不同。他们之中的多数人是传统的帝国主义者，主张对少数民族的自我肯定采取镇压办法。俄罗斯人的优势将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加强。另一些可以称之为“自由派民族主义者”的人论证说，少数民族将被容纳在松散的联邦体系中。非俄罗斯人将取得苏联宪法所许诺的更多真正权利，但这些权利（包括退出联邦之权）在实践上是不存在的。这些权利将使少数民族务必履行义务，即交纳一份保卫和发展国家所需费用的义务。因此，这些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中的“自由主义”，是真正起到其民族主义的作用的：这些政治调整将使俄罗斯人摆脱许多他们现在对其他民族所承担的高昂义务。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还在未来俄罗斯国家政权如何组织的问题上持不同意见。少数“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将替少数民族说话。但多数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将呼吁更多地采用独裁手段解决问题。一些通常称为新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主张通过一些建立在基督教教义奉为神圣的精神价值基础上的手段进行统治。对他们来说，俄罗斯东正教将在俄罗斯国家里逐渐形成压倒一切的影响。另一些权势民族主义者通常称为新斯大林主义者，因为他们倾向于采用毫不

^①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给苏联领导人的信》，纽约1974年版第27页。

掩饰的诉诸武力的独裁办法。他们论证说，俄罗斯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首脑。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把斯科贝列夫将军这个南土耳其斯坦的征服者和对玛里绿洲铁克部落种族灭绝负有罪责的人，看成是标准俄罗斯领导人。其他人还提到西伯利亚征服者叶尔马克，堪察加探险家之一的捷兹涅夫，首先同中国人打仗的俄罗斯人之一叶洛菲·哈巴洛夫（此人对受害者施加恐怖手段并下令将其活活烧死的暴行使人记忆犹新）。①

四、当局对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所提要求的回答

当局显然不准备满足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提出的对待苏联少数民族的极端要求。在文化事务方面，苏联国际主义依然有效。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被抛弃。苏联政体的基础组织还没有发生结构上的变化，无论是朝着“小俄罗斯”方面还是朝着扩张的俄罗斯帝国方面。但是，对少数民族的大规模迫害却在发生。大胆谈论这些主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如 Veche 小组，均被逮捕送往劳动营，或者象索尔仁尼琴那样被驱逐。在领导层内部，俄罗斯知名的民族主义者受到打击，如以强硬路线闻名的 A·N·谢列平被从一切有影响的权势岗位上所清洗。

另一方面，尽管当局对某些争论的回答似乎仅仅是试探性的或模棱两可的，假如它不是担心的话，还是表达了对很多使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辩论火上加油的结果的关心。例如，当局悄悄地把社会一体化公式中“融合”的那一半放弃了，重新提出公式时省去了那些令人不快的词语。新的公式用意在于使苏联公式走向“完全一致”的国家，但不是走向生物学上的均等；它强调，新的苏联人甚至到最终的共产主义理想国时也将保持其民族区别。②

但是，虽然人们力图在民族性方面保持自己特征，当局却开始表达它的担心：“新的苏联人”中很不相称的一大部分很可能将是非俄罗斯人和穆斯林。因而，他们小心翼翼地提出用两种途径限制中亚人和其他苏联穆斯林中过高的出生率。第一、提倡年轻的俄罗斯人多生育，说什么谁没有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就不够爱国。甚至在官方报刊上提出，如果“孕期饮酒”被防止的话，子孙后代的质量便可以得到改进，婴儿死亡率便可以降低；俄罗斯人酗酒率高及其对低出生率的可能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第二、发动学术和专业界讨论出适于苏联境内各共和国和大区不同出生率的可行办法。第三、推广吸收更多的穆斯林妇女参加劳动力大军的办法，这被确信有助于控制这些妇女想生三个以上孩子的欲望。

尽管苏联新宪法没有象一些观察家所预料的那样，重新划定共和国的边界并拨出一些俄罗斯人聚居的领土，不过当局确曾作过试探，只是没有公开地向外界提出来，这种改变是可以想象作为广泛经济改革一部分提出的。近来，当局发言人指出减小共和国边界的意义，强

①维克多·卡尔马耶夫：《默默无闻》，载《青年近卫军》1968年第9期第259—289页。

②苏联领导在融合问题上倒退多远，可以从苏联主要人口学家 S·I·布鲁克在《苏联历史》上发表的文章中看出：“人口普查数字驳斥了异族通婚一方将是一个民族集团成员、另一方总是俄罗斯人的那种错误看法”。首先应指出的是，布鲁克把俄罗斯人排斥在民族集团的名单之外，这里我们只能加以推测。更为重要的是，布鲁克所说的“错误看法”将不是别的而正是融合本身的概念，这将是不可可能的。事实上，它将可以用来从公布的人口普查数字中测定布鲁克的论断正确与否。苏联异族通婚数字总是含糊不清的：他们报道了每一共和国的异族通婚总数，却不报道通婚双方的具体民族属性，因为需要指出融合的正面事实，即使如众所周知俄罗斯人与非斯拉夫人之间的通婚事例也是很少的。因而，公布的数字就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俄罗斯人可以同非俄罗斯人自由通婚，而实际上一些数字却表明乌兹别克人与塔吉克人、乌克兰人与白俄罗斯人、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或其他种结合的婚配事例。布鲁克关于俄罗斯人不总是“另一方”的发现，可以看成是一个驳斥这种颠倒黑白作法的明显论据，假如不是向俄罗斯人担保他们的社会尚未“黄化”的话。

（见 S·I·布鲁克和 M·N·戈勃戈罗：《苏联现阶段民族人口学与民族语言学过程的发展和相互影响》，《苏联历史》1974年第4期）

调一些边界的重新划定将促进经济合理化。他们坚持说，重新划定边界现在是切实可行的，是合乎逻辑的，目的在于适应某些共和国改变了的民族构成。哈萨克斯坦看来将可能成为预选中的靶标。

新宪法还未能就俄罗斯民族的统治地位写出专门条款或剥夺1936年宪法提供给少数民族的象征性保证。另一方面，新宪法也没有给少数民族带来任何新的保证或详细阐述他们在苏联法律保护下、1936年已作出规定之外的特定权利，虽然政府中的“联邦主义者”极力要求写下这些条款。这点可以解释为当局内部“反联邦主义者”（他们的立场通常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一致）的胜利；这些人相信，对少数民族不需要保证任何东西，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

当局对少数民族不服管教的反应是强硬的，但却有些犹豫不决。从领导角度看，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乌克兰的第一书记近些年均因不能控制住地方民族主义而遭清洗。波罗的海沿岸和高加索的骚乱受到严厉镇压。在边疆地区，那些不肯驯服的被流放少数民族（如克里米亚鞑靼人和麦斯赫蒂亚土耳其人）组织的示威，被强大的暴力所驱散。在各加盟共和国里委任俄罗斯人作第二书记的作法又恢复起来了。提高苏联边防军警惕性的运动有了加强，以防止可能来自中国的任何进犯。所有这一切措施，无疑都是讨好俄罗斯人，特别是居住在边疆共和国境内的俄罗斯权贵的，他们对俄罗斯四周爆发真正民族动乱的可能性深感不安。

而且，当局还试图唤起重要的俄罗斯民族象征和形象，以便增强俄罗斯人的自我意识并更多地容纳已经存在的民族意识。它允许公开的（尽管是有限的）为斯大林平反，斯大林对于许多俄罗斯人和许多非俄罗斯人来说，是俄罗斯决心严厉对付不驯少数民族的绝对象征，也允许对斯大林作为战时俄罗斯民族领导人的优秀品质进行热烈讨论。在最近举行的庆祝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的活动中，俄罗斯民族为保卫苏维埃国家所作的特殊贡献受到广泛颂扬。

当局的这些让步未必能使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甚至其担心还没有变成直接俄罗斯民族主义表现的那些俄罗斯人得到持久的满足；然而这些却可能成为不祥之兆。目前，当局对现代和未来“民族问题”的关注，是有限制地进行学术讨论或允许增强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部分地由于以上提及的让步，俄罗斯人自我意识和自我肯定的增长，还没有形成如在其他民族中的战斗抗议形式，没有形成可能迫使当局作出更多让步的抗议。换句话说，这是一幅相对平静、实际上尚不致爆发暴力或恐怖事件的图景。人们只能去思索这些让步将能使人满足多久，这种平静将能持续多久。

五、今后俄罗斯人对非俄罗斯人的回答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可能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对苏联少数民族事务的外界干涉，可以是一个催化剂，不管是来自中国人沿中苏边界对苏联少数民族的宣传，还是泛突厥主义或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东对苏联穆斯林的声援，还是领土收复主义运动，如当前罗马尼亚对苏联摩尔达维亚的要求，伊朗阿杰里土耳其人或土库曼人在苏联的同胞提出的潜在要求或苏联这些少数民族的邻国同胞提出的要求。当苏联同任何一个邻国之间爆发战争时，由于这些国家在苏联具有同一民族或同一宗教信仰的人，这将把俄罗斯人对边疆居民的关系推向新的理论。

当局也可能尽力动员俄罗斯人反对内部威胁。苏联东部和南部边疆的“黄潮”（yellow tide）将继续发展，这将促使非俄罗斯人更确信要争取他们自身不同的民族要求。俄罗斯人同非俄罗斯人之间的民族冲突将日趋剧烈：城市里有的非俄罗斯人飞地已经开始在俄罗斯人中间引起敌意（近来苏联人口学家已指出过）；象红军这样的苏联机构内部，一些非俄罗

斯人已经应征组成民族部队，兵员来源将日渐依靠非俄罗斯人，俄罗斯军人同少数民族军人之间的民族冲突已经发生过，在民族共和国，大多数情况下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已经高度隔离，他们之间为职业和重要岗位的竞争中潜藏着最强烈的因素，对双方都不会带来好结果的个别暴力事件很可能继续增多。在莫斯科，就不敷使用的资源如何分配的辩论将更加尖锐起来，当局将设法缓和已经露头的经济衰退、俄罗斯地区的劳动力不足和能源短缺等现象。如果领导决定继续按非俄罗斯人的条件给他们分配重要资源，则将不会不象所描述的俄罗斯城市中“面包骚乱”那样而呈现出更多的民族主义色调。

为防止事态的更加复杂化，当局将不会放弃俄罗斯民族主义，因为俄罗斯人仍将保持为最大的且在苏联受教育最好的民族。况且，当局正在寻求各种更有效的动员手段去完成国家目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逻辑”、缺乏超群智慧的领袖人物、赞美为建设共产主义理想国进行英勇斗争的宣传，都未能鼓舞起众多的俄罗斯人。今后，当局可能起用俄罗斯民族主义作为动员手段，以便完成政治上、经济上承担的义务。当局很清楚，任何这类决定都将有很高的代价。如果说少数民族的名流会袖手旁观、坐视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在自己受害情况下得到发展，这将是难以置信的。这就是俄罗斯领导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如何在不疏远俄罗斯人的情况下接受少数民族的要求；如何接受并控制滋长着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利用它来完成国家目标但不许诺给它以发展。

(杨允译自美国兰德公司论文选，1978年版)

意大利出版新书

△米兰 1978 年出版了《大地的人类》丛书。此丛书共有十九个分册，图文并茂，是世界上一部优秀的民族学百科全书。丛书以其内容的完整性和可信程度，被广大读者誉为民族学罕见的、不可多得的巨著。

书中图片是由数十名摄影师在世界各地包括人类足迹未曾到过的神秘地点采用千分之一秒高速摄影技术拍摄的。这是一些艺术珍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因此，该丛书的出版是民族学界一件大事。《大地的人类》丛书各分册名称如下：

- 1.《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
- 2.《非洲》；
- 3.《墨西哥和东部美洲》；
- 4.《大西洋诸岛》；
- 5.《亚马孙河流域、奥里诺科河流域和潘帕斯平原》；
- 6.《安第斯山地区》；
- 7.《太平洋诸岛》；
- 8.《南非》；
- 9.《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 10.《东南亚》；

- 11.《印度和斯里兰卡》；
- 12.《中国和日本》；
- 13.《苏联的亚洲部分》；
- 14.《西亚》；
- 15.《北极圈》；
- 16.《阿拉伯世界》；
- 17.《北美》；
- 18.《欧洲》；
- 19.《总目录》。

(赵锦元译自意大利《时代》周刊)

△意大利最近出版了名为《大地图》的地理百科全书，以科学的严肃态度对全世界各国的地理、居民做了详尽的介绍。全书共分六卷，图文并茂，有彩色照片 5,000 余张、现代地图 130 幅和主要文章插图 700 页，使读者一目了然。文字介绍 3,168 页，每一页讲一个专题。

另外还出版了《人类是如何生活的》一书，介绍全世界各族人民每一天是如何度过的。本书是当今世界的真实写照。

上述两书均由意大利最有影响的报纸《晚邮报》数十名记者，深入世界每一角落采访、摄制而成。由《晚邮报》出版、发行。

(赵锦元译自意大利 1979 年 11 月 7 日《晚邮报》)